

## 逼近同理、詳實反思： 評 *The Great Exodus from China*

張茂桂

中央研究院社會學研究所兼任研究員

*The Great Exodus from China: Trauma, Memory, and Identity in Modern Taiwan*. By Dominic Meng-Hsuan Yang, Cambridge: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, 2020, 320 pages

中譯本《逃離中國：現代台灣的創傷、記憶與認同》，楊孟軒著、蔡耀緯譯，國立臺灣大學出版中心，2023，408 頁。

楊孟軒的 *The Great Exodus from China: Trauma, Memory, and Identity in Modern Taiwan* (Cambridge 2020) 出版至今，可查到的英文書評已有 9 篇，<sup>1</sup> 相當受到重視。閱讀本書至少可有兩種策略，其一是從「創傷與記憶」研究的問題意識出發，看台灣外省人的認同變遷，其二是從理解台灣外省人認同變遷出發，探究其與「創傷與記憶」的關係。本文的書寫方式屬於後者，以外省人認同變遷議題開始。以下為個人的評述與讀後心得。<sup>2</sup>

一、綜觀全書，作者用「社會創傷」與「社會記憶」來理解「助憶體系」，用「助憶體系」變遷來解釋外省人認同的在地化與台灣化現象。作者發現，來台外省人與其後裔，經歷不同的歷史情境與

---

台灣社會學第 46 期（2023 年 12 月）。

1 包括 *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*, *Journal of Asian Studies*, *China Quarterly* 等知名期刊，且絕大部分都是佳評。美國 Wilson Center（政策研究智庫殿堂之一）也為本書開了線上的討論會，顯示戰略研究界的重視。

2 我和作者有不只十年的師友情誼，合寫過相關的論文（Yang and Chang 2010）但本文以純讀者身分評論，如果解讀上和作者的觀點產生歧異，這怕也是可能。本文引用時，以英文原著（Yang 2020）為主，若取材於中譯本則註明（楊孟軒 2023）。對於不同意的翻譯用語，我也自行重新翻譯或譯注。

社會條件，因為不同理由與受創經歷，建構出不同的「助憶體系」（mnemonic regime），<sup>3</sup>並以此說明不同世代外省人如何尋求認同與被認同的過程。所謂「助憶體系」，是作者原創的概念，意指有特色的社會記憶與建構法。作者主張：在一定時間中，因為回應某些特定歷史與文化因素，一時間湧現大量有特定主題特徵（salience）<sup>4</sup>的「社會記憶」。眾口紛雜的記憶內容，如果彼此回音共鳴，呈現連結、相互修飾維護，進而形成特色相近的共同記憶敘事，稱為「體系」。

「助憶體系」和「社會記憶」（social memory）有關，但不相等。「社會記憶」指那些有實際生活感知基礎建構，雖為很多人分享，但並不專屬於個人的記憶；反之，「助憶體系」是指有特色的社會記憶內容或記憶法，更具有簡化後類似開場白的主題架構。作者認為不論是「社會記憶」或者是「助憶體系」，都離不開七嘴八舌、「眾說建構」（discursively constructed）的過程。

全書對於外省人認同變遷，提出了這樣的視角：1949 年前後來台外省人（第一代外省人、大陸人），曾為流寓台灣的「陌生人」、「統治者」與「離散」經歷者，或者曾不情願地處於「難民」、「移民」處境，他們與其後裔在不同的時期，因為經歷了不同的社會創傷，展現了不同特色的記憶內容與「助憶體系」。時至 2000 年之後，作者認為外省人在此時湧現出以建構「1949 大出逃」為主題特徵的記憶內容與記憶法。就認同變遷的意義來說，這過程代表外省人呈現「趨向台灣人認同」，或「成為外省台灣人」的台灣化現象，但因為尚有其他影響故仍然不確定，而且這樣的認同變遷也不一定會有最終的結果。

3 中譯為「記憶體系」，但是這樣的翻譯會讓讀者將「記憶」直接聯想到“memory”的同義翻譯，並沒有掌握到 mnemonic 是幫助記憶、記憶輔助法的本意。本文改用「助憶」，更能指出當記憶出現社會特徵並形成體系的過程，和 memory（記憶）的意義不相同。

4 中文本將 salience 翻譯為「顯著性」，其實不如直接說「助憶體系的特徵、特色」，應更容易為讀者所理解。

二、本書描繪了外省人曾出現過三種不同主題特徵的「助憶體系」。首先，以「流寓者」(sojourner)為記憶特色的助憶體系(第二章)；<sup>5</sup>這對應到早年外省人「非志願」在台灣生活的流寓心理與創傷經歷。初來台的外省世代，流露出視台灣及台灣人為中國內地以外的「他者」、「他處」，而自己僅是暫時棲身於此的過客。逃離中國的外省世代，不但曾經歷中國近代史的多重戰爭影響，或曾付出不同的個人或家族代價，來台後更因為各種「不得已」，不少人被迫處於思親、孤獨、「社會原子化」與社會疏離的狀態，既「不甘願」地生活在異鄉，又可能承受排擠壓抑（不一定是來自本地人），但這樣的社會經歷與現實生活，常受到當時主流論述的壓抑、忽視，或被後人所遺忘。作者從當時外省人的「旅台」文學、尋人啟事，或者逼婚、犯罪等失序的社會新聞，以及自殺與犯罪率等社會統計中，找到支持的證據。

其次，以「文化鄉愁」為記憶特色的助憶體系(第三章)；這對應到韓戰後的冷戰局面，台灣納入美國保護傘，特別是在1958年之後，也就是外省人開始覺知到反攻無望、歸鄉無期，將困守於台灣的現實處境，原來的「流寓者」不自然更加「思想起」故鄉與家人，以及今後自我將如何在台灣生存與定位的問題。具體例證如各省旅台同鄉會成立，熱衷於同鄉會雜誌的出版，集結撰述各省地方文史等等，諸多回憶記事與記憶法的湧現為證。這是外省人展開「我自故鄉來」社會記憶的建構，作者大膽詮釋這也是「在地化」(localization)現象，期間並有在台灣各地方尋找類似於原鄉之「根」的努力，但是相關努力並未能受到台灣人的情感回應，在1987年「開放探親」後不久就戛然而止了。

5 中文本翻譯為「過客」。近期關於sojourner的研究，大多承認跨境者在新國度（城市）的生活適應期間，如果出現不歸屬，或前途不確定的搖擺心理與行為，這是普遍的反應，並非心性、文化或道德的問題。本文將sojourner翻譯為「流寓者」，代表外省人雖懷念故鄉或有歸鄉的意圖，但同時也發展出想要在暫住地生存發展的可能；他們通常是有自覺的「異鄉人」。而「流寓」這二字，也確實更常見於當時外省來台世代各種文本書寫的落款，代表暫時於台灣停駐、歇腳於此，而「老家」在他方的漂泊之意。

最後，以「1949 大出走」為記憶特色的助憶體系（第五章），這是台灣政治開始本土化（作者用「台灣化」）、民主化，外省人得以返鄉探親之後，逐漸萌芽的現象。作者由小說《異域》、「老兵文學」、「眷村文學」等文類的出現展開分析，並認定它們對於 2000 年政黨輪替之後的「1949 大出走」講述，有引導的作用，是一個「由『隱』而『顯』」的創傷回憶與重建過程。

本書作者從眾多外省後裔的文本中發現：「1949 大出逃」創傷記憶，屬於較年輕外省世代的「文化創傷」建構。他們原本並無「出逃」的實際體驗、經歷，不過因為 1987 年之後，特別涉及「返鄉」與「後返鄉」的兩岸生活體驗，使得各世代不約而同、普遍地產生了所謂「雙重失落」感——感覺在海峽兩邊，都有不歸屬的疑問。這對第二代影響特別強烈，如同被遺忘在兩岸間的「他者」的創傷感。此時期的社會創傷，促使年輕一代更加審視當代問題的來源，進而回溯到來台世代，展開談論「大出走」的過往，呈現不同特色的助憶內容與方式。

整體而言，本書將台灣外省人想像成是一個「助憶社群」（mnemonic community）：靠助憶法建構出有共同記憶的社群，並將外省人理解為：正成為享有「1949 大出逃」記憶特色的「族群」。本書作者主張，透過社會記憶內容與形式變遷，亦即「助憶體系」變遷，我們可以同理理解外省人社群的處境與認同轉變。而外省人與其後裔，正流露出轉向「台灣化」的「認同趨向性」。<sup>6</sup>然而，由於影響的因素很多，因此這個趨向性不一定穩定，而外省的社群認同建構也不保證定能成功，作者進而提出了結局屬於「未定、懸置」（unsettlement）的說法，並以「外省台灣人」這種認同混合體方式呈現，做了暫時如此但未來仍有所懸置的結論。我認為這是相當有說服力，也很符合當代現實的觀察。<sup>7</sup>

6 外省人的台灣認同趨向性（tropism），原來出自高格孚（Corcuff 2011），作者引伸使用，並引用吳乃德、沈筱綺的民族主義測量為證據（楊孟軒 2023: 310）。

7 Corcuff（2002）應該是最早講外省二代認同混種化的學者。這也是後殖民地民族主義

不過，本書上述關於「助憶體系」特色，應是作者經過「歸納整理」、「深度詮釋」、「命名」等研究過程才得以建構得到的理念類型（ideal type），我認為讀者不宜視其為外省人的各種特質定性，因為體系特色雖然有類型上的意義，但在現實中不一定如此純粹，反而可能是前後堆疊，或同時存在的。

本書的推論，多是從外省人的「社會」活動與「生活」中找材料，幾乎都不是由政府、特定政黨組織或個人立意規劃所生產的文本，是屬於「社會史」的研究；而它也不是「文化史」研究，因為作者雖然不否認確實存在有那些未被指名的「記憶製造企業家」、政治動員者，或者像白先勇、余光中、龍應台等那樣的文壇巨星，但對研究「社會記憶」來說，他們似乎只是證人、證據之一，並不是體系形成的重要原因。

三、影響助憶體系變遷的原因為何？作者認為，助憶體系的變遷和不同時期的「社會創傷」（social trauma）有直接關係。而所謂社會創傷，相對於「文化創傷」（cultural trauma），二者雖然都透過「眾說建構」的過程，但是「社會創傷」在此用來指親歷、親嚐的生命經驗，且可以被認為是真實存在而切身的感受，「文化創傷」則被用來指共享符號意義的集體創造，著重於人為且有目地的建構。

這也是本書嘗試突破既有理論的地方：藉由外省人的記憶內容與記憶法的特色、「助憶體系」的流變，檢視「社會創傷」如何被「記憶」，記憶內容又如何呈現「創傷」，二者又在哪些特殊情境條件下，產生連結、呈現特色。

本書作者特別關注到那些反覆的創傷片段，從原來被壓抑而無法言說的狀態，到某個時期卻突然「湧現」，成為有特色的「助憶體系」的過程。作者以為，這種分析途徑重點在體系的出現過程，在影響「創傷與記憶連結」的社會情境，在發現七嘴八舌的記憶活動等，

---

文獻中常觀察到的過程，意義上是指「土著化」的民族認同發展過程，特色是混合、變異、情境調適與實用性。身為混種者既無法復歸原基的本土，也不能做到「邯鄲學步」那個完全模仿的樣子，進而可能不斷演變且終局是不定的。

如何回音與共鳴，產生特徵、成為體系。換言之，研究的重點並不是記憶內容本身，而這正是目前記憶研究學界所關注的研究途徑。

以上述 2000 年以後，一些年輕世代「眾說建構」的文化創傷來說，這原來和親身經歷沒有太大關係，他們既非「流寓者」，甚至對於「1949」也可能並無特別感受，但是他們受到自己的現實處境影響：一方面社會上存在外省人的污名歧視，另一方面則面臨需要去宣稱自己為「台灣人認同」的壓力。

四、至於人們為何要去選擇性地去建構、重新發掘，或去記住前人的創傷呢？或者故意去遺忘另外一部分呢？又為什麼創傷記憶的人為重建，能對受傷的認同有恢復或療癒的效果呢？

由於我無法自書中獲得滿意的解答，下面是我自己對這個問題的看法。首先，我們必須對「認同」有所理解。「認同」的力量，包涵了那些不能替代、不能偽裝，或者非經刻意遺忘、自我扭曲，否則就無法改變現實的「存在」與「意義」感。有尊嚴的「認同」，不但需要自我肯定，以及和自己有關的社會類屬，同時要能受到正面評價，或者至少要被社會平等接納，這是個人與集體「尊嚴」必須同時被維護的社會性議題。<sup>8</sup> 人們現在透過共同建構的社會創傷敘事、意義分享，可以集體回應現在情境中的逆境，也能合理化新的集體認同價值。因此，所有的回憶言說，大家之所以能進行眾說建構，譜出共享的社會記憶，至少有一部分受到自己的「存在」尊嚴與正面「意義」所驅動。而本書所做的種種記憶與歷史研究，在我看來就是在解釋：外省人如何因為不同的歷史情境、社會條件而重新組裝記憶內容，發展出不同的「助憶體系」，進而能解釋外省人為何、又如何在不同時期點，出現在地化、台灣化現象，並藉以表明其認同中所蘊含的「正面」、「平等」的評價意涵，達到自我療癒目的（這裡講的雖然是以

---

8 對於「意義」、「存在」和認同的關係，請參考張茂桂、吳忻怡（2001）一文。兩位作者從 Charles Taylor 的多元文化主義立場出發，主張「認同」並不是「我是誰」的問題，而是「我為何如此」而存在的道德意涵。該文並提出「尊重與承認」不同的身分認同，對於社會連帶的維護與發展的重要，也不是如楊孟軒（2023: 270）在書中指出，是在期待台灣社會對外省人的過往予以尊重並承認。



外省人為題，但概括來說，其他的群體應該也能適用）。

五、記憶敘事的內容雖有單一起點（single event），但並不等於創傷的起源，這是作者進行歷史研究時，特別強調的一個重點。作者認為：關於創傷及記憶敘事，即使在體系上有一個共同起點，但事實上通常沒那麼簡單。共享記憶的形成，是經歷「多向」（multidirectional）的「眾說建構」，例如，「1949 大出逃」雖然已成為共享的社會記憶，但研究者不應把「1949」誤當成創傷的「單一」起點。

簡單來說，在相當長的時間跨距中，有很多不同情境、觸發了不同的社會創傷。不但不同世代的人感受到壓抑與焦慮的來源不同，即使是同一世代的人，也可能因為不同的社會處境而有不同的創傷記憶。但在特定條件下，他們可能不約而同地朝向一個簡化後的意義架構，協同組成共享的社會記憶，從而形成彷彿有單一創傷起源、創傷特色的助憶體系。身為研究者，我們不能因為一些人異口同聲，而盲目接受他們趨同後的簡單說法，反而要追問，到底是什麼原因促成了突然湧現的共同記憶企圖與認同轉化？

六、本書是涉及和解與正義等議題的研究。本書雖然以外省人「助憶體系」與認同變遷為主要課題，但也是關於當代台灣的研究。正如同本書副標題，本書其實是關於在「當代台灣」所發生的「創傷、記憶、認同」研究。

作者在本書中並不避諱，外省人「大出逃」，相對於戰後台灣曾受日本殖民的六百萬餘「本省人」（台灣人）與原住民族來說，同時是空前的「大」改變與衝擊，這樣「多重殖民」的歷史條件，是導致近代台灣社會創傷的重大原因。從這樣的研究關懷，連結到本書作者最後提到，身為二二八家屬研究外省人創傷的「位置性」（positionality），以及自己如何從原本對外省人感到「怨懟」的研究動機出發，最後卻走向理解外省人悲情且能豁然的立場——所謂「多向同理性未了」。本書作者不但幫助我們理解這個困擾當代台灣「和解之所以困難」的問題，並以「己身為度」的心理歷程，說明一個人

如何可能超越自己的情感結構限制，獲得某種程度的跨界和解。

所謂「多向同理性未了」，是作者引用 Michael Rothberg 的「多方向記憶」（multidirectional memory）與 Dominick LaCapra 的「同理未定、未了」（empathetic unsettlement）兩個概念延伸發展而來（Yang 2020: 11, 273）。作者試圖在書中表達：研究者要能同理認識，並維持客觀距離與批判，既要對創傷有所同情，但不能成為創傷的代言或重複吶喊者，這一切都是多方進行拉扯，既要「逼近」才能達到同理，但又不得耽溺於其中的拉鋸。

此一立場蘊含了歷史正義與創傷記憶的看法，適用於人類群體衝突與和解的普遍倫理議題。我們如果用這種態度來看「台灣人悲情」、「轉型正義」、「白恐記憶」、「慰安婦」等受創經驗與歷史，其實也沒有不行。或者，把視線放得更寬廣些，像是：中國共產黨統治下對於大躍進、文革、天安門事件等的記憶壓抑，以及不斷由官方領銜的愛國家「主旋律」變化，或者東亞「日、韓」、「中、日」的歷史創傷與和解論述演變，或者猶太人大屠殺、加薩走廊問題，或者東歐的戰爭與歷史衝突記憶，都存有本書所講的研究者立場性及倫理性議題，包括了如何療癒，達成和解與正義的意涵。<sup>9</sup>

七、如何分辨「同理理解」與「耽溺悲情」？那麼，作者如何處理這個問題呢？我認為作者以兩個方式來回應，雖然都是研究觀點的回應，但是蘊含了「實際」與「倫理」的意義。

第一個回應，是透過和 Jeffrey Alexander 的「文化創傷」對話（p.5-6）。作者同意文化創傷有被刻意地喚起，受外來權力體制的暗示、直接召喚，或者被過去所制約的成分；不能排除文化創傷因為現實利益而建構的工具性問題。作者也同意 Alexander 的反思：文化創傷的建構雖然可能帶來釋放與療癒，但過度的文化創傷建構，可能帶

9 本書作者與知名中國異議分子的紐約時報記者袁莉，在「不明白播客」podcast 中，從兩岸觀點來看本書，有很精闢的對話。來源：<https://podcasts.apple.com/us/podcast/%E4%B8%8D%E6%98%8E%E7%99%BD%E6%92%AD%E5%AE%A2/id1625856906?i=1000640768341>



來更多的傷害而不自覺，特別是因為自我不斷的情緒重複，帶來更多以自我為中心的趨向，陷入耽溺而無視其他人的情感結構，終致無法看見別人的創傷，更趨向於墜入封閉，落入持續衝突、無法和解的困境。

如同本書重要提示之一，是提醒外省人助憶體系的可能疑慮：記憶內容不可能都是假的，但如果一直無視於其他群體同時存在而平行的創傷，無視於我群在過去的歷史作為，反而可能造成他人的傷害，不但不太可能帶來和解，反而會製造更多衝突對立（當然，這樣的提醒，應該也適用於其他不同群體的歷史衝突與助憶體系研究）。

第二個回應出現在本書最後，作者主張：研究者要根據「詳實」的（informed）歷史研究，以及漸漸逼近的「投入式理解」（working through）來建構自己的論點。<sup>10</sup> 所謂「詳實」的歷史研究，<sup>11</sup> 依我的理解，是指有經驗證據基礎所進行的宏觀且周延的歷史研究，能夠幫助研究者超越受創者不一定符合歷史事實的自我陳述，那些反覆出現的片面與記憶片段（例如口述歷史）。而和此相關的是逼近的「投入式理解」，作者特別援引了 LaCapra（Yang 2020: 278）的說法，原意應包涵了心理創傷的治療意義：治療者與受創者之間（即本書中的研究者與被研究的受創者），能糾結地（engaged）進行對話，研究者與被研究者能反覆地逼近受創經驗、嘗試同理理解，但又能脫離並反思，走出與釋放。相對於「投入式理解」，另一個取向則是「重複吶喊」（acting out）取向，如果說前者是一次一次地靠近受創的實際經歷，逐步走向同理並獲得釋放的過程，那麼後者則是耽溺於傷痛，處於類似重複吶喊、不斷自我宣洩的狀態，陷入去歷史脈絡與因果分析而無法自拔的情狀。<sup>12</sup>

10 我在此處將“working through”翻譯為「投入式理解」，表示不斷逼近、解釋並逐步釋放的過程。

11 中譯本將“informed historical study”翻譯為「修通的歷史研究」，誠為少見且和上下文難以貫通，此處譯為「詳實的歷史研究」應更適切。

12 例如作者對龍應台《大江大海一九四九》一書的描述，用該書來代表接近於「重複吶喊」的取向（楊孟軒 2023：320）。

作者在此引用了 LaCapra 的觀點來說明，如何可能在實證研究的典範下，和後現代的激進的建構模式對話，尋求一個「中間」立場。以下這段本書引用自 LaCapra 的看法，因為很有說明功能，我重新翻譯如下：<sup>13</sup>

對研究者的挑戰是，（我們）不應該一直強迫自己專注於創傷作為無法言喻的經驗，（否則）將弔詭地帶我們見證到：證人與證詞將被破解；我們應該要能詳實地解釋記憶和再建構之間的相互關係，同時能進行批判式的質疑，對創傷現象的問題性（problematics）保持敏感。

八、須要「比較大的心」來同意本書作者的觀點與進行和解。對於外省人助憶體系的真實或虛偽質疑，作者的解答如上述，「既要同理理解其真實的一面，也不要陷入不斷重複吶喊而失去批判質疑」，這應該很清楚也不複雜；但，這對已經有成見的讀者，或者有既定立場的人來說，恐怕並不容易。

舉例來說，不同的讀者可能有各種非預期反應：一、覺得作者在替逆行統治台灣的外來者說有同情心的話，鬆懈了找出「加害者」，反省殖民壓迫的歷史責任問題；二、反之也可能認為作者不小心站在多數「台灣人」上位立場，來表示對少數外省人的同情、憐憫，而這是讓人感到被冒犯的隱藏立場；三、也有可能是認定作者表面上「同理理解」外省人的創傷，實際上卻證明了外省一代「過客」、二代「也是台灣人」的自我哀怨與虛構性，為尋求台灣社會的接納而缺乏自我反省與批判，相對無視於台灣人悲情的存在。以上假設的情境與反應，雖然都不是作者的原意，但都有可能出現。

此外，不論研究者如何聲稱，批判者都有可能說，你在書中可能誇大了 A 群體的創傷經歷，壓抑了 B 群體，或者說，你把 A 和 B

---

13 引用 LaCapra，英文本見 Yang（2020: 272），中文本見楊孟軒（2023: 324）。

放在一個天平比較，那就沒有可討論的是非正義可言了。

因此，不但作者不斷「反側咀嚼」自己的內在矛盾，既要「投入式理解」又要追求「詳實」歷史研究，而閱讀本書的讀者恐怕也需要一顆「較大的心」，才能同理體會這種掙扎與超越的努力。所謂「較大的心」，指的無非是願意跨界進行同理逼近、詳實研究、反省思辨、掙脫各種單一記憶言說法窠臼的能力與態度。這對所有創傷歷史研究課題的研究者與讀者，都有提醒的意義，並不僅限於外省人研究而已。我十分同意這樣的態度與能力（「較大的心」），也對研究者公開宣稱的自我「真實性」有所同感。

作者同時回顧了台灣一些談和解的「高貴」觀點，<sup>14</sup>而在普遍悲觀的形勢下，他認為他只能經由自己在研究過程中的掙扎與最後能豁然的經驗，提供一個「希望」、一種可能，因為他不認為有單方向、明確的和解目標，可以寫下快樂結局，畫下句點。作者這個和解與正義的「希望」，其實是很謙卑的，是從自己寫作的糾結中走出而得到的體會。作者跨界研究的努力以及豁然釋放，具有重要的普遍說明意義，說明了有正義基礎的和解其實很困難，但仍為可能。不過，要讓這樣的感受與經驗發揮更大的群體感染力，進而成為一種社會性的「較大的心」力量，恐怕也有所「不確定」，因為還要看社會、政治條件與情境的作用。

九、關於「證人」、「證詞」材料，在涉及「外省台灣人協會」有關的文本生產與誤會問題。作者在第四、五章使用頗多和「外省台灣人協會」有關的文本生產，作為建構「1949 大出逃」助憶體系的材料。特別是該會的《台灣外省人學術研究出版叢書》，<sup>15</sup>以及國科會的數位典藏計畫《台灣外省人記憶與生命敘事數位典藏資料庫》

14 作者提到如陳光興（楊孟軒 2023: 320）、汪宏倫（楊孟軒 2023: 326）等對於和解為何困難、和解如何可能的觀點。

15 作者援引了張茂桂編（2010）《國家與認同：一些外省人的觀點》、李廣均編（2010）《離與苦：戰爭的延續》、張翰壁編（2011）《扶桑花與家園想像》三冊書中所蒐集的二代文章相關的研究主題。讀者也可參考叢書的總編序，三位編者對於外省人、台灣外省人研究的一些觀點，和本書觀點予以比較。

（包括了「歸鄉迢迢路」主題外，此資料庫也是本書眾多圖片的來源之一）。

第一個問題是關於上述典藏資料庫的正式名稱，中譯本為《台灣外省人記憶與生命敘事數位典藏資料庫》，這個引用沒有問題，上述網站的正式英文名稱是“The Digital Archive for Memories and Narratives of Taiwan Waishengren”，<sup>16</sup>但在英文本中卻誤寫成“Digital Archive for the Memories and Narratives of Mainlander Taiwanese”。二者的差異，就是 Taiwan Waishengren（台灣外省人）與 Mainlander Taiwanese（大陸裔台灣人）的差異。

「台灣外省人」和「大陸裔台灣人」的差異重要嗎？考慮文本生產過程，典藏主體和目的，以及作者做結論的證據來說，這確實重要。上引資料庫在 2010～2012 年建立時，刻意選擇了「台灣外省人」，而不是「大陸裔台灣人」，主要因為研究者對於當時的典藏資料提供者，無法得知他們在認同上是台灣人，或是外省台灣人，因此也不應該對他們的認同有太多暗示或指引。這不只是為了研究的信實度要求，同時也是尊重被研究者的認同的倫理要求。

遺憾的是，當英文版本使用了 Mainlander Taiwanese 標記時，無意間是在暗示英文讀者：這是「關於大陸裔、現在是台灣人認同」的典藏計畫，得以用來佐證「外省台灣人」與「1949 大出逃」助憶系統的誕生連結，肯定了外省人似乎正朝向台灣人認同發展，或者呈現更多的「混同」、「趨向」的意義。但這應屬作者事後的詮釋，不能當成是該資料庫的 informed history 研究的一部分。

第二個問題是作者在不同地方都適當地感謝了「外省台灣人協會」（2004 年 8 月成立，簡稱外台會）的一系列出版（楊孟軒 2023: 304-305）。確實，外台會可以說是生產上述材料的發起點與節點，我是上述數位典藏資料庫的計畫主持人，也是外台會實質創始和參與人之一，以下容我以個人的「口述法」補充說明。

---

16 正確用法已經出現在 Yang and Chang（2010）。

第一，從外台會生產的眾多文本看來，其來源主要是主動參與外台會計畫的市民的草根記憶、自我書寫，也有出版年輕研究生的論文的大眾版等計畫。相較於龍應台或王偉忠等有大資本、大喇叭支持的文化生產，外台會更具有從普通民眾、公民社會出發，幫助低層外省人講述那些「當時」較不為人知的外省人角落的故事，以及不受主流人類學、社會學青睞的學生研究的特性。<sup>17</sup>如果把上述這些文化生產都放在差不多相同的時間脈絡，用來鋪陳或佐證「1949 大出逃」「七嘴八舌」的助憶體系誕生，這是作者的綜合意義詮釋，所謂「理念型」建構，也是研究者的特殊創見與貢獻。

問題在於研究者的理論意圖、詮釋架構，被不小心反轉過來，投射到當時文本生產者的脈絡，賦予了生產者非本意的解釋，或者改變了當時的歷史描述，此時研究者無意間以「效果、結果」，或者觀察到的「現象」類型與研究假說，反過來解釋實際「起源」的認識問題。

第二，「外台會」誕生於 2004 年總統大選、選舉公平性有巨大爭議之後。當時台灣面臨選舉結果無定論、社會充斥著偏激觀點與有毒的陰謀論，「子彈是假的」、都是「自導自演」的、「國家被偷走」激越言論等民主危機現象，繼以歷久不衰的街頭群眾動員與老兵上街的「誓死」抗爭。外台會並不是如本書的鋪陳，是為了處理「外省人認同」危機、「雙重失落」的情境而誕生；其實正相反，是受到上述激動外省人士在大選後的「不相信、也拒絕認同」的政治動員刺激，從而「反向」進行溫和的溝通理解工作。換句話說，並不如作者所述，外台會以對抗外省人污名作為「主要目標」，努力向其他台灣人呈現「外省人也是島國想像共同體受之『無愧的一分子』」（楊孟軒 2023：305）。

17 外台會的活動雖然也力博媒體之關注，但是幾乎被已經擁有龐大文化發言權的其他的外省菁英、作家們所忽略或不理；也有抹黑它的，將其講成支持台獨立場的「外省人台灣獨立促進會」的化身。事實上，外台會和外獨會二者理念並不相同，甚至對「族群相互尊重與承認」的策略也有明顯的歧異。

「反對外省人被污名化」這件事，並不是外台會的主要目標，雖然逐漸成為顯著的工作內容。反對污名是重要的，因為污名必定是種族性的問題，而且在台灣被污名的不只外省群體，因此反污名是普遍性的倫理立場，不是外省人單獨的問題。外台會在其活躍的時期，至少介入了數個「相互污名」的社會衝突，例如：一、反對當時兩大名嘴汪笨湖與趙少康激化聽眾的言論；二、對拆除中正紀念堂主張應經過廣泛的社會溝通，形成公民意見；三、聲援面臨要被周錫瑋縣長下令拆除的「高砂義勇隊紀念碑」（違建）；四、為曾被國民黨政權污名的外省人政治異端平反等，同時也希望讓國族與父權敘事下的女性，不論省籍，有更多的發聲機會。

外台會的主要目標，不是提倡「外省台灣人認同」，而是很低層次的，希望成為溝通的「橋梁」、做「搭橋」工作，反對激進的外省人認同政治，主張各方面的污名都要停止，從而試圖讓極端不同意的各方，都可以降低相互的防衛機制。這是試圖進行「溝通理解」對話的必要過程，因為「溝通理解」即便很卑微，但在當時都非常困難，而要能成功，就必須「不說教，不鼓吹」自己的認同位置，以尊重並承認多元認同為出發點。即使自稱的「外省台灣人」標誌，也是一種橋梁性質的宣示，承認自己的混雜認同後，從台灣為主體性出發的定位，嘗試將自己置身於看起來對立的兩種認同之間。

回溯來看，我個人的觀點類似這樣：外台會自詡為是立基於台灣人認同的外省人後裔或關心者，他們是以促進不同群體的「溝通理解」為主要目標。為了這個目的，有必要特別強調去除外省污名，讓低層的外省人在「安全」的氛圍下可以說出自己的故事，讓年輕研究者有發表的空間。社會記憶的「眾說建構」、回音共鳴的過程，讓「外台會」舉辦的文化活動成功地成為低層外省民眾訴說與研究的「觸發器」（trigger），雖然這樣的行動可見度與方法無法比擬龍應台、王偉忠等更強大的文化生產，但仍足以「非預期的」方式，如同本書所述，成為多方向建構的「1949 大出逃」的助憶體系。

此外，作者認為外台會試圖向台灣社會證明，外省人也屬於「島



國想像共同體受之無愧」的話語，我個人認為並不恰當，因為不論是「外台會」或者任何人，其實不須向任何人證明，誰才是「當之無愧、值得的」台灣人（或者中國人、眷村人、任何人）。光是提出這一類詢問，就難免不讓人覺得是一種挑釁與冒犯，類似問題的本身就應受到批判。

最後，我對於本書的評論，可以下列三點來歸結：

首先，本書從台灣的外省人研究的角度來看，選取的材料驚人且多元，且不乏出人意料的結果，例如舊報紙的找「下女」廣告、找失聯親人或徵求義父母的小廣告，早期報紙的社會新聞，《暢流》雜誌的流寓者分析，同鄉會（與大陸地方文史雜誌）的懷舊，太原五百完人紀念（碑）到小說《異域》的特殊意義，社會創傷與文化創傷的證據連結等，特別是外省來台第一世代的創傷處境的研究，充滿原創而且精采。而所謂外省人與黨國的「非神聖同盟」(unholy alliance)，面對充滿日本殖民遺緒但可教化的台灣省同胞 (coachable compatriots)，二者的早期衝突與歷史隔閡問題，從社會史材料出發，彷彿神來一筆，讓人忍不住擊節。

再者，從「創傷及記憶」與認同的理論旨趣來看上述問題，本書明顯地擴大了既有族群、民族主義一直強調政治動員、殖民與反殖民、統獨政治的視野，不但超越了既有外省人有關的研究甚多，同時也將為認同研究、台灣當代研究，開拓新的領域。

如同作者的研究提醒，研究者必須有「多向性」的觀點，兼顧同情理解力以及「詳實」的歷史研究力，在「解構」與「同理理解」的對立中找到定位，這對創傷記憶的研究、認同的研究、和解如何可能，都有重大的意涵。

本書因此不僅僅是關於「外省人」，如果將時間延伸、空間擴張，本書的觀點對於不同的創傷記憶與歷史，都具有深刻的學術意義與倫理啟示。例如，對於台灣不同群體的創傷記憶與研究，對於中國近代史、東亞、中東、歐洲等有關的創傷研究，都有普及的可能。

如同我在前面的評介中強調，不論是研究者和讀者，都需要有

「較大的心」，才能接受跨界同理的真實性。這是本書給所有讀者的一個挑戰，也是對以正義為基礎的和解工程的提醒。

最後，前面提到書中一些舉證或引用的問題，其重要意義在於不能拿事後的理論建構，反過來回溯解釋事情的起源問題，特別是涉及重要當事者（證人）的時候。其實任何「詳實」的研究，永遠都有待完成之處，目前這些「失誤」及有關外台會的呈現，還有可辯論與探究的空間，但並不影響本書的論點與重要貢獻，更無損本書「較大的心」的實踐及訴求。

### 參考文獻

- 李廣均編，2010，《離與苦：戰爭的延續》。台北：群學。
- 張茂桂、吳忻怡，2001，〈關於民族主義論述中的認同與情緒：尊重與承認的問題〉。頁 147-180，收入林佳龍、鄭永年編，《民族主義與兩岸關係：哈佛大學東西方學者的對話》。台北：新自然主義。
- 張茂桂編，2010，《國家與認同：一些外省人的觀點》。台北：群學。
- 張翰璧編，2011，《扶桑花與家園想像》。台北：群學。
- Corcuff, Stephane. 2011. "Liminality and Taiwan Tropism in a Postcolonial Context: Schemes of National Identification among Taiwan's 'Mainlanders' on the Eve of Kuomintang's Return to Power." Pp. 34-62 in *Politics of Difference in Taiwan*, edited by Tak-wing Ngo and Hong-zen Wang. London: Routledge and Curzon.
- Corcuff, Stephane, ed., 2002. *Memories of the Future: National Identity Issues and the Search for a New Taiwan*. Armonk, NY: M. E. Sharpe.
- Yang, Dominic Meng-Hsuan, 2020, *The Great Exodus from China: Trauma, Memory, and Identity in Modern Taiwan*. Cambridge: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. 楊孟軒 (2023) 蔡耀緯譯，《逃離中國：現代台灣的創傷、記憶與認同》。台北：台灣大學出版中心。
- Yang, Dominic Meng-Hsuan and Mau-kuei Chang, 2010, "Understanding the Nuances of Waishengren: History and Agency." *China Perspectives* 3: 108-122.